

在青海治多寻找长江文化的源泉—— 天边的水



三江源核心区青海治多县。

本报记者 史春波 张迪 摄

长江,从格拉丹东雪山滴水而下,滋润了美丽的三江源自然保护区。

长江文化考察队第一路来到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治多县索加乡,探寻长江文化的源泉。

25岁的藏族小伙多杰扎西刚刚完成了一场不是旅行的旅行,时间就在国庆假期。

他开车3个小时,去看了长江的源头。“我喜欢那里。”他用一口流利的普通话这样对我们说。

因为距离长江源最近,多杰扎西家被当地称为“长江源头第一家”。这里位于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治多县索加乡当曲村,4500多米的海拔,寒风呼啸,刚刚下过一阵冰雹,但远处群山之间,依然是满天阳光跳跃。

和扎西一样,我们对长江的源头也是充满好奇,充满敬畏,充满感恩和热爱。

绝大多数文明有着自己的母亲河,那是万物之始,生命之源。为此,我们不远千里,开启这场长江寻源。

我们所寻找的不仅是地理意义上的长江水源,更是滋养土地和民族的精神之源、信仰之源和文化之源。

寻源: 一场跨越千里的取水

“治多”在藏语里的意思是“长江源头”,长江从治多县向东而下,这里也被称为“万里长江第一县”。我们来到治多县索加乡,是青海省最偏远的乡镇之一。

索加乡全域面积约6.5万平方公里,平均海拔约4500米,因高寒缺氧、艰苦偏远,被称为“天边的索加”。

我们没有想到,寻找长江源头的路途是如此艰难。

从细雨江南出发到西宁,接着驱车10多个小时到达玉树,再往治多县城,又从县城来到索加乡。

人在这里显得格外渺小。漫长的车程中,与我们相伴的有高原反应,也有窗外无穷无尽的美丽风景。

当略显“声嘶力竭”的车颠簸着驶入长江源保护区,草地一望无际,大小沼泽湖泊分布其中。

那天下午,就在多杰扎西家几公里外的草原上,我们亲眼看到了自长江源

流淌而来的泉水。这一汪泉并不大,也不激烈,安静且持续地汩汩冒泡,在青苔和天空的映照下呈现蓝绿色。

这里有无数这样的细流,如同毛细血管,温柔地汇集成长江水,弯弯曲曲,浩浩荡荡,流经大半个中国,哺育一代又一代在长江边生长的文化与生命。

我们取了满满一瓶水,清冽,纯净,透明。那一刻,伴着耳畔呼呼的风声,大家想起了那首关于长江的古老情诗。

“我住长江头,君住长江尾。日日思君不见君,共饮长江水。”无数次,我们吟诵着宋朝人李之仪的词,并被其中的这份深情打动。

如今,我们终于从诗歌中走来,从长江的人海口走来,实现了千年前难以抵达的这场浪漫相会。

护源: 住在“天边”的使命

寻找长江的源头,寻找的还有源头

里的文化、源头里的生命。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,千百年来,他们对水源,既感恩又敬畏。

他们没有诗人那样的浪漫,但是他们朴实、血性,懂得这片土地的宝贵,愿意舍弃一切乃至生命去保护它。

多杰扎西一家世代放牧为生。在他家的新房子里,他和家人热情招待了我们。他还告诉我们,国庆假期他去了长江的源头。

“我喜欢这片草原,喜欢我们长江的源头。”他这样和我们说。

虽然从小就住在长江源头边,但因为交通不方便,村里人几乎都没去过长江源头,也不知道源头长啥样。”多杰扎西说,后来村里去乡里和长江源头的路陆续修好了,自己每年都会约着朋友去几次长江源头。

“路也不大好走,还要开3个小时的车。”他说。

他喜欢在长江源头坐上几个小时,听听水声,看看不时从边上奔跑而过的藏野驴,家乡的美好在这一刻变得更

具象。多杰扎西的父亲夏西朋措是这片草原上的生态管理员,虽然识字不多,但他每天都会认真记下生态观察日记。在提到自己如何救助一头被野狼咬伤的藏野驴时,寡言的夏西朋措用手势配合说话,兴奋之情溢于言表。

守护源头的生态,是他们融入生命的使命。索加乡,还是英雄之乡。

多杰扎西从小就听过杰桑·索南达杰的故事,并以此为荣。

索南达杰是可可西里和三江源生态环境保护的先驱。他先后12次深入可可西里,开展野外生态调查和以保护藏羚羊为主的环境生态保育工作。

1994年1月18日,索南达杰和队员在可可西里押送犯罪分子时遭到袭击,不幸牺牲。

30年过去了,索南达杰的精神依然在这片壮阔的高原上时时传颂,从未被遗忘。在治多县索加乡寄宿小学里就有他的纪念馆,学校的广场上还立着他的

塑像。一个叫白马措毛的五年级学生向我们介绍这位英雄的事迹,那些故事已经深深烙印在孩子们的骨子里,影响着他们的言行。

学校还有这样一句打动我们的校训:“我们的母亲,是天边的索加;所以我们就有顶天的担当。”

这片高原上的人们,就是用这样“顶天的担当”,守护着他们的“母亲”——长江的源头。

探源: 来自源头的长江之歌

同样作为“天边人”,文扎则有着另一种使命。他的花白长须在风里飘扬,像是从雪山神话里走出来的人物。

文扎是索加人,还做过索加乡的党委书记。这些年,他痴迷于长江文化的研究,称之为“探源”。

有一些人,不问得失地默默探求长江文明,探求长江的精神源泉。文扎无疑是其中的一个。他送给我们一套书:《源文化》。

2016年4月,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在青海启动。那时,文扎开始进行长江源文化的调查。他邀请四五位省的文化人士,一起考察整个三江源,以寻根问祖的方式,把源头上最深层、最民间、最古老的沉淀,从冰川上唤醒,融化成文字,最后记录成了《源文化》丛书。

“我们在源头看到的,不仅是江河的摇篮,在那里能够寻找到人类的情感之源、哲学的思想雏形、神话的原始风貌。”他激动地说。

我们一直聊到黄昏。日暮时分,群山寂静。文扎给我们背诵关于长江的诗词,讲述关于长江起源的民间故事,他的藏语歌声响荡山间——“你从雪山走来,春潮是你的风采……”

这是一首来自天边的长江之歌。(本报记者 史春波 纪驭亚 施涵予 青海日报记者 洪玉杰 公安安加)

在重庆凝视长江边的世界文化遗产—— 大足石刻何以延续千年



出现在《黑神话:悟空》游戏场景中的大足石刻护法神龛雕像。 本报记者 彭鹏 摄

火爆全网的中国首款3A游戏《黑神话:悟空》中,“那只猴子”挥动棍棒穿越风雪,拾级而上,将笼上暮色的地狱变相龛和金碧辉煌的千手观音带到了玩家面前。这也让场景的取景地,有着中国石窟艺术最后辉煌之称的世界文化遗产——大足石刻迅速翻红。长江文化考察队第二路的重庆首站就来到此地。

大足石刻位于重庆市大足区境内,建于唐末至南宋间,有摩崖造像五万多尊,以宝顶山和北山的规模最大、刻像最集中、造型最精美。它是世界八大石窟之一,1999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《世界遗产名录》。

“大概3年前,《黑神话:悟空》创作团队来到宝顶山,对石刻进行实地取景拍摄。今年游戏推出后,游客更是络绎不绝。”宝顶山石刻管理中心副主任曾庆川告诉记者。

曾庆川介绍,宗教与世俗的完美相融,构成了宝顶山石刻的鲜明特质。在石壁前走过,上一秒,眼前的画面还是神仙腾云驾雾,下一秒,便是市井百姓在烧菜洗衣。

“你们看文殊菩萨手中的七级宝塔,能想象得到它高近1.8米,重近千斤吗?文殊菩萨的手臂向外伸出2米,手托宝塔,悬空八百多年而不坠落,你们知道这之中有怎样的奥秘吗?”在雕于峭壁上的华严三圣像前,面对这些头顶崖岩、脚踏莲花、高约7米的石像,曾庆川为我们揭示大足石刻背后古代造像的“黑科技”。

“秘密就在文殊菩萨身上,那看似轻盈飘逸的袈裟衣袖上。”他解读道,一方面,衣袖内侧和石像身体相连,宝塔和手臂的重量,得以巧妙地引向主像身上;另一方面,衣袖、佛手和石像的膝盖之间,一个三角形结构悄然形成,从而提供了一种稳定的支撑。

“大足石刻历经千年仍模样完整、色彩如初,这背后,一场守护石刻的接力在先人与今人之间展开。”曾庆川介

绍,早在雕凿之初,宝顶山石刻的创刻者、南宋赵智凤为减少雨水对佛像的侵蚀,就在佛像上缘雕凿雨棚,又在石刻内部设置精细的导雨槽。

今天,从保护石刻出发,人类的智慧更是有加无已。据了解,考虑到大足石刻周边区域潮湿,容易滋生微生物,清华大学在此建立了专门的科研观测点。

而民间的守护,则像偏僻散布在山间的大小石刻一样默默无闻。

“在山中石刻所在的洞窟前,有一些简易搭建的窝棚。一些安静的身影,数十年如一日守在这些简陋的窝棚里,只为保卫石刻的安全。这些人是大足的村民,他们还有另一重身份——大足石刻义务文保员。”同行的当地讲解员李凤告诉我们,不知从何时开始,当地村民承担起对石刻的义务保护工作,自发组织轮值,甚至举家出动。

把宝贵的年岁,献给满山沉默的石刻,值得吗?面对我们的困惑,李凤现身说法。

“有一次,我在向游客介绍石刻《牧牛图》时,一只斑鸠落在了牧人身上。

当它飞走时,牧人手臂上被蹭落一层黄沙。我顿时很心痛。”她说,几乎每个大足人从小就会被教育一句话:保护石刻。这份守护石刻的情愫,已流淌在大足人的血液中。

除了吸引游客年复一年奔赴前来,这里也孕育了“大足石雕”这一国家级非遗项目。在大足石刻群的山脚村落,我们登门拜访了该项技艺的传承大师,大足石雕国家级非遗传承人、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刘能风。

进入刘能风的工作室,形态万千的石雕作品堆满了这间小小的屋子。“这石雕手艺,我坚持了40年。拿起锤子,我就开始雕凿;放下锤子,心里也在琢磨。”怎么才能把石雕雕好?刘能风认为,要高度还原大足石刻技艺的原貌。为了将石刻看得更细一点、学得更透一些,他曾在宝顶山石刻窟内连住数晚,也曾曾在崖边睡过一整夜。

“一门手艺要想活下来,不能只有对前人的传承,后人还要有所创造。继往开来,才能生生不息。”说到这里,刘能风话语间的重庆味似乎更浓了。

(本报记者 高心同)

在江西铜岭探访三千年前的古矿井—— 见证青铜时代的绚丽辉煌



江西瑞昌铜岭铜矿遗址。 本报记者 杨朝波 摄

春秋时代的码头门,西周的榫卯木架,商代的木轱辘和温酒陶器……很难想象,面前这些外形古朴的展品,件件都讲述着中华文明悠久的历史。

江西省瑞昌市夏畈镇铜岭村,当长江文化考察队第三路来到这里时,一座崭新的红棕色建筑已拔地而起——8000平方米的遗址博物馆即将正式开放,馆墙上书写着巨大古朴的篆书“铜岭铜矿遗址博物馆”。

我戴上头盔,爬进馆里仿造的巷道,四周漆黑下来的瞬间,仿佛一下子穿越回3000年前,听见挖矿工人的脚步声。

“我们听到的,其实是文明的声音。”九江市博物馆原馆长、研究员汪建策说,“青铜时代的到来,加速了中华文明的进程。”

铜岭,当地人又叫“铁山”。这一带蕴藏着丰富的铜铁矿石资源,自上世纪50年代末开始,一直为江西九江管辖的钢铁厂供应铁矿。

跟着瑞昌市博物馆原馆长刘礼纯爬上矿山,我注意到这一带的土壤大多为带矿粒的红色黏土。土坡上,一小截残损的木头露出地表。“那是近3000年前的木头,是古人用来加固矿井的木支护遗存。”刘礼纯说。

再走几步,他又指着一个杂草掩盖下只露出一半的井口说:“这是春秋时期的矿井巷口,为了保护下面的遗存,我们把它回填了。”

像这样的古竖井,“铁山”上已经发现了100多个。

接着,他又踩了踩脚下说:“这下面有商代的采矿巷道,最深的地方有50米。”

一切,都掩埋在毫不起眼的小山头下。

爬上山顶,刘礼纯回忆起36年前那桩震惊考古界的往事。

1988年春,铜岭村的村民在修路时,挖出了地下的古代竖井和巷道,里面有不少木质构件和青铜器皿。

一天,九江冶金总厂副厂长周明节来到工地,他意识到这些可能是文物,便叮嘱铜岭村的老支书将这些器物送

到瑞昌市博物馆。

不久后,刘礼纯作为江西师范大学历史系文博班的一员,在瑞昌市博物馆看到了这些青铜器,“不得了!我立刻意识到,这可能是一处铜矿遗址出土的工具。”

经过上报,江西省文物局迅速派人前往瑞昌铜岭进行实地考察。1988年9月,考古队正式进驻铜岭,国家文物局决定将铜岭铜矿遗址作为重点发掘项目。

通过调查、勘探、发掘,铜岭铜矿遗址总面积为3.5平方公里。那么,这个遗址到底能追溯到多久远的时代呢?

刘礼纯至今记得那个日子:1988年12月11日。那一天,在11号竖井的底部,考古人员发现了一件商代中期的陶器。这是个温酒器,底部还有被火灼烧的痕迹。“这是一次重大的突破,让我们确信,遗址可以追溯到距今约3330年前。”刘礼纯说。

3000多年前,一个矿工在采矿间歇坐在巷井里,忙里偷闲小酌了一杯。

3000多年后,这壶酒促成了1991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。

铜岭铜矿遗址包括古采区、冶炼区、选矿区和生活区。其中,古采区集中分布面积约7万平方米,不仅保存有地下采

矿系统,还保存有露天采矿遗迹,在已发掘的1800平方米范围内,发现古竖井、巷道、露天坑、工棚、选矿场等遗迹,并出土了石、木、铜、陶等生产生活用具。

冶炼区散布面积达18万平方米,发现炼炉6座及大量的炼渣,估算古代铜渣渣合计有六七万吨。按比例计算,在商至春秋这1000多年里,古人在铜岭炼出了120万吨至140万吨铜。

这处遗址证明,中国大规模开采铜矿的历史至少有3000余年,是中国迄今发现的矿冶遗址中年代最早、保存最完整、内涵最丰富的一处大型铜矿遗址。

“它不仅将我国采矿历史向前推进了300余年,还解决了商周时期中国青铜文化大宗铜料来源的重大课题。”刘礼纯说。

如今,铜岭铜矿遗址博物馆已经正式开放。规划建设铜岭铜矿国家考古遗址公园项目总投资约8.38亿元,建成后将成为集考古、观光、科普、研学于一体的现代化国家考古遗址公园。在徐徐展开的商周时期长江流域青铜文明的繁华盛景画卷中,江西铜岭是印证中国青铜时代绚丽辉煌的重要一站。

(本报记者 郑辉)